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编译工程与现实定向

吴晓明

首先我要谈的是中央编译局的编译工程。对于我们搞哲学、特别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来说，中央编译局所提供的资源，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受用。可以说，现在在学术研究领域当中能够有这么好的学术翻译资源的，大概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学科。我也看过一些译得很好的西方名著，但是总体上来讲都比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规范、高质量的翻译。因此，中央编译局翻译马列著作巨大的工程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从中国历史上看，大概只有当年佛学的中国化过程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巨大的工程。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局，而且最近这些年来，编译局的工作一直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确实非常了不起。这使我们想起当年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它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用整箱整箱的黄金去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文献照片。同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在编译局能看到，它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以这样一种积极的投入，而且以这样一种巨大的理论热情、极其认真严肃的学术姿态来做这样大的工程。所以我们确实非常感动，而且其翻译和研究的质量，据我的了解，是非常杰出和非常优秀的。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一部俄文版和一部德文版同时出现，但是德文版和俄文版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俄文版要优越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在文献的研究、积累和投入方面要强很多。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工作在质量方面一直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迄今一直受惠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我确实觉得我们整个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文献和资料方面做的最好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和整理工作。

其次我要谈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这本杂志。这个刊物的名称不仅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意味着这两者的结合，而且我认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就是切中并把握社会现实，这甚至应当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线。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把做现实的与做理论的完全分割开来，学术理论做得好的似乎就不要理睬现实，关心现实的人仿佛就理论都很差，这样就形成一种分裂状态，这种状态在学术界是普遍存在的。我认为从黑格尔开始有一个重要转向，他认为哲学、理论的最高要求就是能够揭示并且能够切中所谓的“现实”。现实并不是通常我们想象的那种东西，好像就是“事实”。“事实”在哲学上大体被了解为什么呢？它是在知觉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但“现实”肯定不是这样的东西。现实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不是出现在存在论中，而是出现在本质论中的，所谓“现实”，就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恩格斯也专门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所以，在哲学理论上我们应该把现实这个问题辨清，应该把这一点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生命线。欧阳康教授讲到，从实践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有多大的成就取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如果从理论上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前途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如果抓不住这一点，抓不住现实，那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境遇就不会很好。就不会有远大的前景。我们知道，在社会历史方面，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要薄弱得多，恩格斯说只是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贫乏。费尔巴哈贫乏在什么地方？他抓不住现实，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却能够牢牢地抓住社会现实。当然，这个现实跟马克思理解的非常不同，甚至恰好相反，所以需要有一个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我认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界，目前问题的重点确实在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这两者的真正结合。唯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所谓中国道路才

能够从这个地方被理解到、被把握到并且从理论上被加以深刻的说明。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很早就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道路,有的只是苏联道路的变种,那就是大城市的武装起义。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样如此,用黑格尔的话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外部反思”。而在外部反思的理论方式中,实际上也没有中国道路,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变相的形式,一种或多或少是不成熟的、但总而言之是有缺陷的形式。这种研究状况和理解方式必须有极大的改变,所以,抓住、理解、切中、揭示当今的社会现实恐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负担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这个杂志的前景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揭示、切中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社会现实。总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这个题目、这个杂志的名称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主题,

如果杂志能在这一主题上真正成为我们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头羊”的话,那么我认为它就必须在社会现实这一度上有重要的理论阐述和深化。这决不意味要研究现实就不需要深入的理论,恰恰相反,要达到“现实”是需要很高明的理论的。就我的观点看来,大体上,黑格尔、马克思可以说是两位导师,他们的哲学是能够深入到现实当中去的。海德格尔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当中去了。什么叫历史的本质性一度,那就是社会现实的一度。所以海德格尔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比一切其他的历史学来得优越。我觉得从哲学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与实现”这个主题恐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如果说中国道路的真正开辟在实践意义上意味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发展前景,那么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景则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握、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 在实现“两个结合”上下功夫

陈学明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在原有的基础上办出更高的水准,我在这里冒昧提点希望。我主要是希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在实现“两个结合”上下功夫,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结合上闯出一条新路,做得越来越好。

观察目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以我个人看是不太理想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脱离现实,走纯学术的研究道路;另一方面,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影响力。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远离了现实,从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就处于“自我放逐”的状态,尽管我们可以凭那些“高深”的学术成果当教授,获取学术地位,但一想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现实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只是“学术”而不是

“思想”和“理论”,我们内心实际上是很空虚的。有个青年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如果说以前的研究曾把“外哲”做成“马哲”,又把“马哲”做成“政治”,那么当今的研究则是把“马哲”做成“外哲”,又把“外哲”做成“纯学术”。至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由于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什么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就会“乘虚而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为解决现实问题所开出的“药方”。我们多么渴望更多地看到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成果。

我觉得,我们必须强化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结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认识。这里首先有一个对当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可的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央文件上一再指出对此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